

100%的村上春树是可能的吗

□林少华

全民阅读——这四个字再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在会后记者招待会上也就此现身说法。想必与此相关,读书活动如春潮一般漫涌开来。这不,就我来说,刚参加完上海、南京的读书会,就作为所谓开奖嘉宾去北京参加“2014中国好书”颁奖晚会节目的录制,回来又参加了在青岛如是书店举行的专题读书会——读书人参加读书会讲读书,再没有比这让人欢喜的事了,简直比一下子年轻十岁还让人欢喜。

教书、译书、写书,研究书。但我毕竟译书较多,所以在青岛读书会上我首先讲翻译,讲我译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片山恭一是不是100%“原装”,这里且以村上为例。

其实甭说村上,即使“I love you”这么再简单不过的短句,翻译起来也一个人一个样。张爱玲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张爱玲的朋友问张爱玲如何翻译“I love you”,并告诉她有人翻译成“我爱你”。张说:文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还有,刘心武有一次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脱口而出“我爱你”。刘说:研究红学的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就足够了。再

举个外国的例子。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有一次让他的学生翻译“I love you”,同样有学生译成“我爱你”。夏目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今宵月色很好”,足矣足矣。

怎么样,一个人一个样吧?所谓百分之百等于“I love you”的翻译,好像谁都做不到。语境不同,身份不同,笔调不同,译法亦不同。

这方面,林语堂有个多少带点儿色情意味的比喻:“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风格。”你看你看,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来模样嘛!可能有人嫌我啰嗦,一次演讲“互动”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译的村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我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非我狡辩,也不但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忠实于原作的译者——概莫能外。说白了,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存在。这是因为,文学翻译属于艺术活动,必有主观能动性参与其间,必有作者本人的文体或语言习惯介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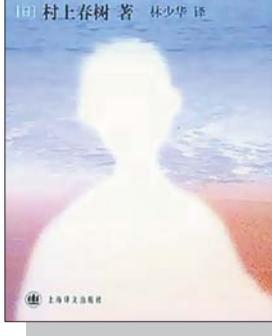
换个说法,我翻译的村上只能是“林家铺子”的村上,不



可能是张家铺子、李家铺子的村上。不过,这种既非原作者文体又不是译者文体,或者既非日文翻版又未必是纯正中文的文体缝隙、文体错位,正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价值所在——新的文体由此诞生,原作因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也就是说,翻译必然多少流失原作固有的东西,同时也会为原著增添某种东西。流失的结果,即百分之九十的村上;增添的结果,即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二者相加相除,即百分之一百零五的村上,因而客观上超过了百分之百的村上——这又有什么不好?艺术总在似与不似之间嘛!

况且,正因为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所以它已不再是日本文学意义上的村上文学,而成了中国文学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村上就像演员,当他穿上中文戏服演

海边的卡夫卡



完谢幕下台后,已经很难返回原原本本的自己了。原因在在于,返回时的位置同他原来的位置必然有所错位,不可能完全一样。此乃这个世界的法则,任何人都奈何不得。

说来也怪,日本当代作家中,还是翻译村上的作品更能让我格外清晰地听到中文日文相互咬合并开始像齿轮一样转动的惬意声响,更能让我真切地觉出两种语言在自己笔下转换生成的实实在在的快感,一如一个老木匠拿起久违的斧头凿子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是的,这就是村上的文体。说夸张些,这样的文体本身即可叩击读者的审美穴位而不屑于依赖故事本身。不无遗憾的是,文体这一艺术似乎被这个只顾急功近利突飞猛进的浮躁的时代冷漠很久了。而我堪可多少引以为自豪的对于现代汉语一个小小的贡献,可能就是用语重塑了村上文体,再现了村上的文体之美。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汉语本身的贡献、翻译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碎碎念

另类“雅乞”

□刘武

讨饭这种事,大概是古已有之。一般的乞讨说不上雅,有的是真可怜,有的是装可怜,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装有病,有的是真残疾,有的是装残疾,反正,要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让人心甘情愿掏出点钱或东西来。

乞讨过去叫“讨饭”,那是真讨饭。我小时候在家,经常见到有叫花子上门来讨饭,父母就舀一小碗大米给他们。有时,在小餐馆见到要饭的,老板会给碗剩饭或剩菜打发一下。不过,现在的乞丐大都不能叫“要饭的”了,他们只要钱,钱少了还有点嫌弃,叫他们“讨钱”的或“要钱”的似乎更妥当一些。

乞丐有真有假,这里不做讨论。我想说的是“雅乞”,就是那种比较优雅的乞讨。这类乞丐好像外国比较多,其实中国以前也不少。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电影《大浪淘沙》中有这样一幕,于洋扮演的靳斯绶在济南街头看到一老一小唱着《琴声悠悠唱济南》的小调:“大明湖呀千佛山,七十二泉呀天下传”,居然还是正宗的山东腔。接下来,他又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玩杂耍、练功夫的。这唱小曲和耍把式的,就都是“雅乞”。

中国著名的“雅乞”中,瞎子阿炳算得上一个,他一生中很多时间就是靠在大街上拉二胡乞讨为生,并创作出几首流传后世的二胡曲。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伍子胥据说也做过一段时间“雅乞”,他全家被杀,混过昭关,来到吴国都城苏州时,已身无分文,只好吹奏随身携带的长箫,借以乞讨过活。

我在国外旅行时,见到过那些五花八门的“雅乞”,比如有人在街头敲打塑料桶,有人把自己装扮成一尊雕像,有人弹吉他或吹口琴,反正,这都是当众耍一门手艺,也不说任何乞讨的话,就等着人们自觉自愿给掏些零钱。相比那些低三下四、拱手作揖甚至可怜巴巴要人行行好、救救命的叫花子,“雅乞”当然显得更有尊严、更有艺术感,更让人愿意帮助。

不过,有一种另类“雅乞”,却是我第一次听说,令我脑洞大开。不久前我去拜访一位86岁高龄的书法家,老人告诉我近几年他碰到一种情况,让他防不胜防、不胜其烦、有苦难言。

那是什么情况呢?原来,这些年来,他经常接到电话,说是某某出版社或画社,出版了一本他的作品集,想送给他两本样书。老人开始不知有诈,就说请他们寄过来即可。隔了一段时间,那些人又打电话来,问是否收到样书。老人说没有啊,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些人就那那我们派人给你送过去吧。

不久,有人找上门来,一般都是妙龄女郎,穿着时髦,能会说会道,真的给老人递过一本画册,或单册,或合集,封面都是这位书法家。接下来,女郎就坐在老人家里耗着,不拿走你两幅字画绝对不动身。老人无可奈何,又不能打电话报警,只好送两张字画打发了事。

关键是老人说:“这些出版物都是假的,有的是盗用出版社名字,有的是用假出版社名字,可能他们就印几本,然后就借此上门来讨字画。”老人指着屋子一角的各种画册说,这些都是,一年能收上百本,里面书法家的照片和作品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这种“雅乞”可真是闻所未闻,上门乞讨,不要饭不要钱,直接要你的作品,然后拿你的作品转卖出去,赚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我去地铁的路上有个瞎子,常年坐在路边拉个二胡,永远一个曲调。不管天气多冷多热,他都坚持不懈,印象中至少有五六年了。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肤色黝黑,拉的曲调也不好听,可我觉得他是真正的“雅乞”,比那种拿着假画册上门去要字画的时髦女郎要强得多。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作家)

名家言

“然后”及其他

□李亦

每个时期都有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前几年,影视剧让一些寂寥的词迅速活跃起来,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唱响了“投入”,一时间,“投入”满天飞;《秋菊打官司》火了“给个说法”;《天下无贼》让“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成了俏皮话。仔细分析,这些词语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因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在某种情势下有了新意,才让这些词语在正常语境里有了强大表现力。

但语言最忌重复,先用者尚尚新鲜感,大家都用,这些词就会被嚼烂。嚼烂了顶多没滋味,嚼得太过久则要发酵、生菌。幸好,上述词语很快被“给力”、“穿越”、“任性”等取代。由此看来,某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流行并无大碍,但要让一个词流行十几年,这就要认真对待了。最近几年流行词的推手,影视作品逊位给网络,这是媒体的竞争,让我们看到网络的强大传播力。能让一个词流行实属不易,让一个句子成为经典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需要才华和劳动,是创造。

有语言觉悟的人对别人的创造会十分尊重,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也会用别人的创造,但他一定用得十分谨慎,并带有一定程度的再创造或引申。古时候,有敬惜字纸的习惯,这是因对语言敬重而对书写语言的纸也珍惜的良习,这种虔敬心态是让我们的语言保持纯粹和干净的必要条件,一旦对字纸词语的敬惜丧失,语言也就随之失去个性,甚至失去尊严。

近十年来,有个叫“然后”的词使用频率极高,高到畸形甚至病态的程度。使用这些词

的大都是四十岁以下的人,女性多于男性,三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下,年龄越低,使用这个词也越没顾忌。央视某频道有个四五岁的小儿做节目,也一口一个“然后”;一个被访的外国留学生,也能话不离“然后”地畅言,可见,“然后”一词已经影响到汉语传播的源头。

“然后”本是一个极普通的连词,目前流行的“然后”大都使用这个词的原意,多数把它用作助词或口头语,好像无“然后”就不能开口说话。

下面是一些口语实录,“然后”尽在其中:

上午去商场买衣服,然后商场人很多,然后服务员待答不理的,烦了那地儿,然后一辈子不去那个商场。(妇女公车上聊天)

在家干吗?没干吗,然后上网,你呢也放假了吧?我可没你那么自在,然后也放假,我还上班呢?(公司白领电话)

我不听姐姐的话,心里觉得然后神要来惩罚我。(受审女犯)

然后才放心然后。(接机对话)口头语一向因人而异,比如,“这个来讲”、“这个的话”等,大家用得最多的是“这个”,当思维和语言配合不好,或跟不上思路时,一个“这个”可以缓解语句凌乱,但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成百万上亿的人都用“然后”做口头语就让人十分费解了。

我要找找“然后”的源头。古人用“然后”显然不完全是现在的连词用法,有然而后的意思。近现代的用法比较一致,真正使这个词出了圈,变成千万人的口头语不过十几年。流行的用法始于港台(不是权威考证),娱乐圈里一些在国外长大的华人,面对汉语媒体,各种洋语都不适宜现场言说(即便适宜,洋语也没学好),只好用大打折扣的汉语回答提问,其间时常拿“然后”、“这个样子”、“那”等词救救急。因为国语不过关,许多香港影视演员都需要配音,他们面对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内地演员,会为自己的蹩脚国语自愧,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种半吊子国语却传播甚广,备受内地某些人追捧。开始,“然后”作为一种时尚挂在了内地演员的嘴上,进而成了时髦用语,好像一句话里没有“然后”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仅仅是赶时髦还不足惧,怕的是向技术和经济倾倒,许多人没有被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欧式长句子征服,没有被老庄孔孟、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征服,而被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港台语征服了。港台自然有许多值得内地学习的东西,比如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比如香港对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以及卫生的普遍讲究等,唯独他们的国语是薄弱环节,他们最不能逞强的也是在内地人面前说国语。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内地人模仿“然后”,港台人做梦也想不到。

“然后”里藏着一些人的无知与浅薄。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本名李传敬,代表作有《药铺林》、《双凤门》等)

